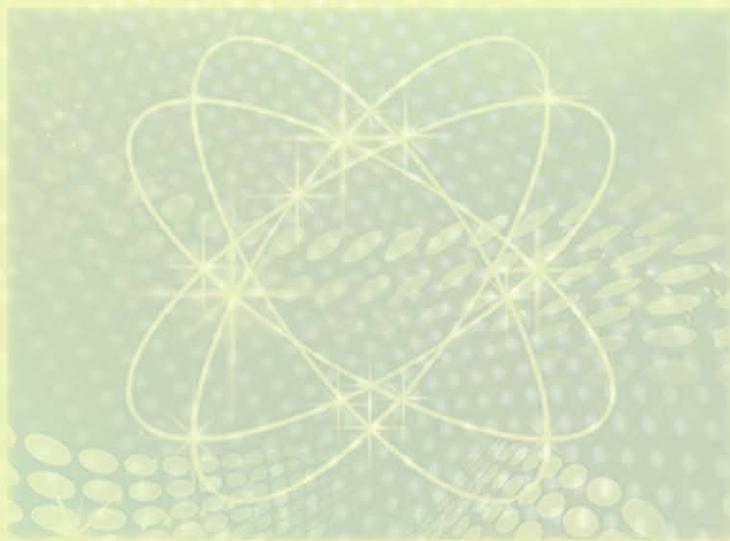


汉语与中国文化

孙永兰 编著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汉语与中国文化

孙永兰 编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汉语与中国文化研究对象

- 一、语言与文化定义
- 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 三、汉语与中国文化的研究对象
- 四、汉语与中国文化的研究特点

第二节 汉语与中国文化研究的性质、意义和方法

- 一、汉语与中国文化研究的性质
- 二、汉语与中国文化研究的意义
- 三、汉语与中国文化研究的方法

第三节 中国汉语与文化研究简介

- 一、中国古代有关汉语与文化研究的论述
- 二、中国现当代有关汉语与文化研究简况

第二章 汉字与中国文化

第一节 汉字与文化的关系

- 一、汉字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 二、对汉字的评价

第二节 从汉字形体考察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

- 一、从汉字考察中国古代社会
- 二、从汉字考释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

第三节 从以形表意汉字看民族思维特征

- 一、从以形表意汉字形成看民族造字特点
- 二、从以形表意汉字看民族整体直观和“置心物中”的思维特点

第四节 形声字发展趋势的文化背景和意义

- 一、形声字发展趋势的文化背景
- 二、形声字形旁与声旁配合的结构方式
- 三、从形声字形成途径看音义兼表方法
- 四、从形声字看历史文化遗迹

第三章 词语与中国文化

第一节 词语本义的文化迹象

- 一、从词语本义看古代物质文化
- 二、从词语本义看古代制度文化
- 三、从词语本义看古代汉民族心理文化

第二节 词义引申的基础和特点

- 一、词义引申的基础
- 二、词义引申的方式和特点

第三节 特有词、色彩词、数词与社会文化、民族心理文化

- 一、何谓特有词、色彩词、数词
- 二、特有词、色彩词、数词的文化意义

三、特有词、色彩词、数词的词义特点

第四节 从词语发展看社会文化

一、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促使词语发展

二、新时期汉语词汇发展的表现

三、词语发展的文化意义及其价值

第四章 语法与中国文化

第一节 汉语语法结构的文化特征

一、重意合，不重形合

二、词句语义的模糊性

三、异形同义和同形异义的现象

第二节 汉语语法形式及其特点

一、语序

二、虚词

三、语调

第五章 熟语与中国文化

第一节 从谚语、格言、歇后语看中华民族文化

一、谚语、格言、歇后语的定义及其来源

二、谚语、歇后语反映的主要内容

三、从谚语、歇后语看中华民族文化

第二节 从成语看中华民族文化

一、成语的特征

二、从成语看中华民族文化

第六章 汉语与佛教文化

第一节 佛教的传入及中国的佛教

一、佛教的起源及传入中国

二、佛教宗派简介

第二节 汉语与佛教文化

一、佛教对汉语音韵学影响

二、佛教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第七章 姓名与中国文化

第一节 姓名的源流与文化

一、古文化孕育出百家姓

二、人名系统与汉民族文化

第二节 姓名是民族文化的镜像

一、姓氏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

二、人名的民族文化内涵

第八章 地名与中国文化

第一节 中国地名与语言学

一、地名的语言学特征

二、地名中古义、古音的保留

三、地名中的方言成分

第二节 地名与历史文化

一、地名反映帝王年号和帝王用字的避讳

二、地名反映人民所爱戴的历史人物

三、地名印证民族迁徙和民族间接触的历史

四、地名反映社会的经济文化特征

第三节 地名与社会文化、民族心理

一、地名反映古人迷信活动和宗教信仰

二、地名反映中华民族对龙神崇拜的心理

三、地名寄托人民求安宁、求福寿的意愿

四、地名反映中华民族重宗族的社会心态

后记

第一章 引 论

第一节 汉语与中国文化研究对象

今天，我们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正在大踏步地迈向新世纪，此时我们从各个角度来探索中国文化的奥秘，清理我们的文化遗产，描绘它的真实面貌，发扬它的优良传统，评论它的千秋功过，规划它的锦绣前程，成了一项严肃而又富有魅力的历史使命。

当我们翻开中国历史的画卷、回顾社会的发展进程时，我们会深刻地感触到，整个中国文化所建构的灿烂文明史完全建立在语言媒介的基础之上。语言的产生意味着灿烂多姿人类文化的诞生，同时文化的发展也促使语言更加丰富和完善。人们都生活在土生土长的文化氛围中，有时却感觉不出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语言与文化关系如此密切，我们从汉语角度出发，对汉语与中国文化一些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有着更深刻的意义。本书主要阐述汉语与中国文化研究的对象、性质、意义和方法，并对汉语与中国文化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

汉语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当今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当务之急。本书着重从汉字、汉语词汇、汉语语法、熟语、姓名、地名和佛教等方面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进行论述和分析。研究的模式是“从汉语看中国文化、从中国文化看汉语”。在具体论述中引证了大量生动语言事实和反映当代汉语与中国文化的最新成果。其论点和材料不仅能进一步证明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而且对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能够补充新血液、完善新观点。

一、语言与文化定义

（一）语言

《辞海·语言文字》中指出：“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它跟思维有密切联系，是思维工具，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没有语言，人类的社会生活无法维持。从它的结构看，语言是以语音为物质外壳、以词汇为建筑材料、以语法为结构规律而构成的体系。”美国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Ed

ward Sapire）关于语言的定义是：“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凭借自觉地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来传达概念、情绪和欲望的方法。它是一种文化功能，不是一种生活遗传功能。”他们从不同认识角度出发来论述语言的定义，体现出他们不同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可以说语言本身也属于文化范畴，是人类用于传递文化信息的工具，也就是指谱写人类文化史的最重要的符号，一般指口语和书面语。

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他们大多数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汉族人数最多，他们使用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普通话不仅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而且列入宪法第十九条“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汉语又是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所以研究它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文化

关于文化的定义，历来众说纷纭。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认为：“文

化或文明，是作为一个社会的成员所获得的认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及其他能力与习惯的综合体。”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伯（Kroeber）搜集并列举从1871年泰勒开始至1951年80年间，学者们给文化下的定义计160多种，可见人们对文化探讨的热情经久不衰，也说明文化的定义言之不易。看来要恰如其分、准确无误地给文化下定义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文化的含义，一般来说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美国著名学者萨姆瓦（Larry A. Samovar）对文化的阐释是：“文化是一种积淀物，是知识、经验、信仰、价值观、处世态度、社会阶层的结构、时间观念、空间关系观念、宇宙以及物质财富等等的积淀，是一个大的群体通过若干代的个人和群体努力而获取的。文化是持续的、恒久的和无所不在的，它包括了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所接受的一切习惯性行为。”我们认为他所阐释的是广义的文化，即为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的总和。罗常培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一书里引用人类学家戴乐尔（E. B. Tylor）的话：“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合，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一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所获得的其他一切能为习惯。”这里所说的是狭义的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中国近代学者梁漱溟说：“文化，就是吾人生所依靠之一切……俗常以文字、文学、思想、学术、教育出版等为文化，乃是狭义的。……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梁先生给文化下的定义既有广义又有狭义。本书所说的文化涉及的范围比较广的，包括精神、制度和物质等方面，因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精神财富，形成了人类独有的意识形态、思维能力和生活方式。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就会产生与其适应的文化。在我国历史上，上古社会的古文化是如此，秦汉时期形成的较为专制的封建文化也是如此。如陈安仁著的《上古中古文化史》，其内容就涉及社会的政治、农业、税制、币制、官制、兵制、法制、宗教、美术、教育、学术、文学、社会风气等文化形态。

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最初指的是文化中技术及人工制品等元素，现在趋向于指那些支配人工制品的生产和使用的文化现象。这囊括关于他们的观念、生产方式、使用方法的知识及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它是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基础。制度文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的产物，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下形成的诸如礼仪、宗教、婚姻等各种社会制度；精神文化也说为心理文化，它是指人的思维方式、思想感情、信念情趣、价值观念和社会心态等，它是隐性的，在文化大系统中处于深层次的。

我们就拿“玉”为例来说吧。中国历代玉石制作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世界上有“玉石之国”、“东方瑰宝”的美称。常言道：“黄金有价玉无价”，玉石皎洁闪光，玲珑剔透，被誉为大地万物、日月星辰之精华。战国时，还有价值连城的一块宝石——和氏璧的历史史实。玉石的形成须经千万年的地质运动和板块碰撞，真可谓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琢玉的技巧、流派有苏州、杭州制作的精雕细刻的佩饰、生活用品，具有历史悠久、全国之冠的美名；有北京制作的具有庄重、古色古香的御用玉器，盛于乾隆年间；有广州制作的备受欢迎的作为摆设、装饰的制品。自古以来，玉石用于养生、养颜；慈禧以玉拂面；《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以“玉”为命根，“玉”上镌刻着“莫失莫望，仙寿恒昌”，薛宝钗的“玉”镌刻着“不离不弃，芳龄永继”。玉之珍贵可标志身份，《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的“温润而泽”象征“仁”。古人认为佩带玉镯、玉珍品等可避邪免灾，也可清醒头脑，也许是微妙的矿物产生的物理作用。

“玉”的保护方法是避免高温、暴晒，用茶油擦涂，用温巾擦洗等。甲骨文“丰”即“玉”的本字，像“玉”之串之形。

《说文解字》有145个跟“玉”有关的字，这说明汉以前玉器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从制玉的工具、技术、产品、流派到汉民族对“玉”的信念，心理观念等都在语言中被沉淀下来。再拿“笔墨纸砚”这文房四宝的“砚”来说吧，因“砚”形似田，古代文人喜欢把砚比喻作“田”，苏东坡说：“我生无田，食破砚。”戴复古更加直截了当地说自己是“以文为业，砚为田。”在农耕社会里，田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既然“砚”是文人的“田”，那就必须“笔耕”，然后历史上就有写“砚”的书籍、有收集“砚”的癖好等，从工具变为文化的象征，并寄于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有标识之一。从以上两例也说明每个民族的文化实际上是这个民族主体性的体现，文化传统是民族的血缘、民族本性的显现。一个民族社会形成的文化有自己的特征。首先是整体性，有一定的恒久性，而不是支离破碎的一盘散沙，它有凝聚力，传统性，并且世代延续下来。中国文化是一个迥异欧美文化的特殊模式，尽管近百年来受到欧风美雨的冲刷，但只改变它的某些外在形式，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未受动摇。

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最重要的文化信息载体，一种社会现象，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又是该社会文化的一个方面，所以它们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其密切程度表现如下：

（一）语言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关键。又是文化存在的重要标志，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怀特在《文化科学》一书中指出：“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能使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得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怀特所指的符号是指人类的语言和文字。因语言符号具有最大的包容性：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人类所有的生产、创造、教育等文化活动靠语言记录、表达；语言文字具有永久性，它把人类各种文化活动、知识经验记录并代代传下去，可以说它们是历史的“活化石”，我们可以通过语言文字来了解考察历史、追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踪迹。

语言是人类独有的一种能力，由于人类有语言符号，才能运用语言符号进行思维，并把思维活动的过程和积累的知识经验传授下去，语言符号不仅使人类摆脱动物界，而且在建立人类社会的过程中创造了文化，使人类从野蛮和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状态。

（二）文化是语言的“底座”。没有文化，语言也就不可能存在

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e）在其《语言论》一书中说：“语言有一个底座……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他又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

语言的地位无论怎样重要，它毕竟是精神文化的一部分，语言在其产生、变化和发展中一直受到文化的制约和影响。是人类的文化创造活动产生语言，没有人类起源过程所创造的原始文化，就不可能有原始的语言。社会的分化和统一，通常也会影响语言的分化和统一，后来语言的发展变化中大多受到文化变迁的影响和制约。

文化是人类独创的，文化和人是同生同长的，没有文化，就不可能有人类。理解文化的本性，切不可偏离“人”这个核心和根本，必须体现人的主体性。而

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晶，语言文字在这文化中有生存、贮存、留传的作用。这个民族过去的文化靠着它流传，未来的文化也仗着它推进。

三、汉语与中国文化研究对象

中国传统语言学称为“小学”，“小学”在汉代时指称文字学，隋唐以后，“小学”的概念扩大了，成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统称。直到清末，西方语言学东进，马建忠首次运用语言学方法，分析汉语语法结构，1898年《马氏文通》刊行后，中国才有了系统的语法学。

本书不是文字学、词汇学或语法学等语言学科专书，而是从文字的构形、意义及词汇本义、引申义、语法特点等入手，研究它们与文化的关系，揭示其丰富内涵所体现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另一方面又以文化为视觉，探讨汉语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规律，从文化变迁去寻求语言变化的动因，其目的在于获得语言文化功能的认识。本书偏重古代传统文化，不仅可使读者扩大汉语语言文字知识，而且扩大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以便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

四、汉语与中国文化研究特点

汉语像一面镜子，清晰地反映了民族历史文化的多种事物和所蕴含的文化渊源和文化精神，而民族的文化现象又大多沉淀在汉语语言文字中。上面已提过，这门课程既是研究汉语，又是研究中国文化，主要研究它们相互贯通、印证的部分，所以具有以下的特点：

（一）汉语与文化的相互制约和影响

汉语与文化的相互制约和影响是双向的，有的是民族文化对语言的制约和影响，有的又是汉语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有的也很难分析出是文化先影响汉语，还是汉语先影响文化。罗常培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中引用帕默尔(L. R. Palmer)的话：“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它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

以“行酒”为例，古人喝酒分宾主坐定，主人独据一几，宾客在旁，也是人各一几，安排专人巡行各几斟酒，叫“行酒”。《法言·修身》：“宾主百拜，而酒三行。”《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潜夫）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满觞。’”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第一》：“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将车，季方持杖后从，长文尚小，载著车中。既至，荀使叔慈应门，慈明行酒，余六龙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宋·苏轼《泛金船》：“杯行到手休辞却。”从上面古籍各例看出，宋朝仍有“行酒”文化现象，今天家宴或设宴请客已没“行酒”，此词也就消失。现在人们常说“敬酒不吃吃罚酒”，可从此词看到古人的“行酒”习俗，现存的白话小说这样说，今天戏曲舞台饮酒也如此摆设，只是因演戏，要让人观看，把“几”改为“桌子”而已，但现代口语里仍有“行酒”的古文化痕迹，如“酒过三巡”是由“行酒”而来的。又如中国独特文化——汉民族吃饭使用的“筷子”一词。古代并没有“筷子”，因古人席地而坐，吃饭用手抓，不用筷子，就像今天马来人一样用手抓饭吃。《礼记·曲礼上》正义：“古之礼，饭不用箸但用手”。《礼记》提到的“箸”即今天的筷子。“箸”是什么时候才用的呢？据说最迟到商纣王时用“箸”吃饭已很普遍。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忿狷》：“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筯（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唐·韩愈《顺宗实录二》：“良久，宰相杜佑、高郢、瑜皆停筯以待。”宋·陆游《野饭》：“何必怀故乡，杯前借箸题筹。”明·程良《咏竹箸》：“殷勤好客问竹箸，甘苦乐先尝，滋味他人好，乐空来去忙。”清·赵

翼《陔余丛考·呼箸为快》：“俗呼箸为快子”。从上面古证，说明到清朝才呼“箸”为“快子”，后因当时“快子”多是用竹做的，所以“快”为“筷”。人们不禁要问，呼“箸”不是很好吗？为何要改用“筷子”呢？请看陆容《菽园杂记》的记载，便可一目了然，书中说：“……谓起於吴中。凡舟行讳住讳翻，故呼箸为快子”。因“箸”与“住”同音。又据《推蓬寤语》载：“世有误恶字而呼美字者。如立箸讳滞，呼为快子。今因流传之久，至有士大夫间，亦呼箸为快子者，忘其始之”。据说自“箸”反其道而改称“快（筷）”以来，民间即视筷子为吉祥物，新婚妇女受孕或分娩时，祈求筷子降吉祥，“筷子、筷子，快生贵子也。”民族的心理和习俗促使语言的变化。当时汉语中的“箸”也作为词素，构成“竹箸、火箸、铁箸”等。如洪迈《夷坚志·三补·临川偶女》：“因其抗对加箠，偶火箸在侧，取而杖其背，误中要害致然。”闽南方言今仍称“火钳”为“火箸”。又如中国改革开放后，人们渴望富有，热衷吉祥之物，“恭喜发财”已成为人们春节见面的祝贺语，“八”与“发”谐音，人们对“八”特别喜爱，听说1988年8月8日结婚的人特多，结婚送聘金挑选带吉祥的数目，如“168”与“一路发”谐音，不送整数，而送一万六千八百元。这是因为汉语语音因素与人们求吉祥、求发财的心理文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结果。语言的灵物崇拜同样引起对某些数词的崇拜心理。认为某个数、某个词能给人带来幸福或带来灾难。

（二）汉语中古文化、地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保留和影响

1. 汉语中保留的古文化：现代汉语或方言中保留了一些古代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痕迹。语言文字有稳固性的一面。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些曾为人们应用的旧事物，这旧事物虽已消失，但反映这旧事物的词语仍沿用下来，从这词语可看出古代的物质文化。“镜”这个词，人们看到“金”字旁会觉得十分奇怪，因现在的镜子是用玻璃制成的，背面涂上水银用于照人的器具。其实“镜”的古字是“监”，左上角是目的变形，右上角是人的变形，指一个人睁大眼睛对着装水的“皿”照。《尚书·酒诰》：“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传：“视水见己形，视民行事见吉凶。”说明上古以水为镜。中古以铜为镜子，用“鑑（鉴）”表示“监”的本义，“监”用于“监察、监临”。《新唐书·魏征传》：“以铜为鉴，可以整衣冠”。“鉴”，即青铜制成的大铜盆，用于照人，因大铜盆与平面镜不同，另造“镜”指用青铜制成用来照人的平面器具，至今仍沿用，词义仍保留在闽南方言中，闽南地方戏传统剧目《陈三五娘》，戏里的主人公陈三为了与五娘见面而打扮成磨镜师傅，在丫环的帮助下，借为五娘磨镜的机会与她见面。俗语说：“镜越磨越亮”也证明古之镜用青铜制成，才磨不破，而是越磨越亮。

唐人朱庆余《闺意献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作者借闺房之事比喻考试，自比新娘，把张籍比作新郎，舅姑比作主考官，这里的“舅姑”指的是公婆，为什么昨天的舅姑成了今天堂前的公婆呢？即男子娶舅父或姑母的女儿为妻，婚前的舅姑便是婚后的公婆。《礼记·内则》：“妇事舅姑（公婆）如事父母。”《尔雅·释亲》曰：“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姑。”“妻之父是外舅，妻之母是外姑。”反映上古曾经流行表兄妹通婚的习俗，当丈夫是表哥时，妻子对丈夫的父母自然称“舅”、“姑”，后来不再盛行表兄妹通婚，并采用公婆代替舅姑。这种表亲结婚的习俗一直在旧中国的民间流传着。这是中国古代社会所谓交表婚制的反映。

有些古语词中某些反映古文化的词义在普通话中已消失，而在方言中仍保留着。

大家：婆婆。妻子称丈夫的母亲。如新妇较赢大家（媳妇胜过婆婆）。《晋书·列女传·孟昶妻周氏》：“事之不成，当于奚宫中奉养大家，养无归志也”。南朝梁·沈约《宋书·孙棘传》：“棘妻又寄语嘱棘：‘君当门户，岂有委罪小郎？且大家临亡，以小郎嘱君……’”唐·赵璘《因话录》卷三：“大家昨夜不安适，使人往候。”

新妇：①称儿媳。如新妇有孝大家（儿媳孝顺婆婆）。《战国策·卫策》：“卫人迎新妇”。《后汉书·何进传》：“张让子妇，太后妹也。让向子妇叩头曰：‘老臣得罪，当与新妇俱归私门。’”②已婚妇女的自称。《玉台新咏·古诗为焦仲卿作》：“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贤媛》：“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新妇”即新来的妇人，汉族的婚姻习俗，妇人到男方家落户。

有身：怀孕。如新妇有身啊（媳妇怀孕了）。《诗·大雅·大明》：“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毛传：“身，重也”。郑玄笺：“重，谓怀孕也。”《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厉王母得幸，有身。”宋·洪迈《夷坚甲志·董氏祷罗汉》：“是月，妾有身……凡十有二月而生一子。”

2. 汉语中的地域方言与文化：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分布在广大的地域上，由于中国历史上多次社会分裂、人民的迁徙、民族的融合和地理的阻隔，经过漫长的岁月，形成了今天七大方言区：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方言区，以上海话为代表的吴方言区、以长沙话为代表的湘方言区、以南昌话为代表的赣方言区、以广州话为代表的粤方言区、以梅县话为代表的客方言区，另一个是闽方言区，由于闽方言纷繁复杂是全国方言之最，故找不到代表点，其内部分为：以福州话为代表的闽东方言，以厦门话为代表的闽南方言，以莆田话为代表的莆仙方言，以建瓯话为代表的闽北方言，以永安话为代表的闽中方言，以长汀话为代表的闽西客家话，以邵武话为代表的闽北客家话，以平和九峰为代表的闽南客家话等。所谓地域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是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发展起来的，他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慢慢形成具有自己地区明显特征的人文、历史文化形态和风俗习惯。它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主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方言就是不同地域文化的符号之一，不同的方言反映着不同地域文化。我们在研究汉语与中国文化这主流文化的同时，不能不研究汉语方言与地域文化。

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地域方言与文化也不断地被吸收到汉民族共同语中，丰富了汉语词汇和中国文化。如闽南人称地瓜为番薯，这词语也被吸收到共同语中。闽南人旧称洋人为“番仔”，所以常用“番”冠于外国输入的物品名称前，如把煤油称番仔油，火柴称为番仔火，水泥称为番仔灰，连衣裙称为番仔裙，洋楼称为番仔楼等。《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介绍：“番薯原产南美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西班牙人把它带到菲律宾。据清朝人周亮工《闽小记》等书说：‘明代万历年间，福建因台风摧毁农作物而遭受灾荒，总督金学派人到菲律宾寻求救荒作物。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由陈经伦运回番薯种，为纪念金学的功绩，曾一度称金薯。’”也许“番薯”是从福建传到其他地区的缘故，南昌、梅县、广州、阳江、潮州等地都把地瓜称为番薯。有些语素和普通话相同，顺序与普通话相反的“同素异序词”的方言词，如人客（客人）、闹热（热闹）也被吸收到普通话来。上海话的“阿拉、瘪三、师傅”等，广州话的“冲凉、炒鱿鱼”，四川话的“麻辣”，北京话里的“帅、棒、派、大款、大腕儿、面的、倒爷”等都被吸收到全民共同语中。

陈章太先生在《普通话词汇规范问题》一文中谈到：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有了很大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

化。在这种大变革的态势下，新事物、新观念如潮水般涌现出来，而普通话一时又没有那么多相应的词语来称说，于是一批港台词语便随港台事物一起进入了大陆，其中一批已进入普通话。如“法人”、“资深”、“周边”、“转型”、“酒店”、“宠物”、“蛇头”、“歌星”、“空姐”、“共识”、“传媒”、“爱心”、“氛围”、“多元”、“反思”、“举措”、“评估”、“界定”、“拓宽”、“拓展”、“研讨”、“认同”、“投入”、“看好”、“疲软”等。沿海经济的高速发展，新的经营观念、文化及生活方式的推广，伴随着它们的载体——港台话（指粤方言、闽南方言）先在粤、闽蔓延，然后其势不可挡地北上，有些生动活泼的词语自然获得承认，丰富全民共同语的词库。估计这批词语将有增长的势头。

1987年以后，海峡两岸大门打开，1997年香港已回归祖国，祖国大陆和港台的词语虽然不再是泾渭分明，而越来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还存在着一些差异，关于方言和地域文化差异的研究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际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祖国大陆称“办公室”，台湾叫“公事房”，香港则称“写字间”；“影集”祖国大陆指存放照片的本子，台湾本指“可以分集放映的影片”，后也指电视连续集。

以下分类举数例说明：

台湾国语的一些词与祖国大陆普通话同形异义。如：

普通话	国语（台湾）
爱人（指丈夫、妻子；情人）	只指情人（丈夫、妻子称为“先生、太太”）
草地（长草的地方）	乡下（草地人即指乡下人）
晚婚（达到结婚年龄以后再推迟若干年结婚）	可指再嫁妇女
检讨（检查）	指总结研讨
客座教授（某校教授同时受聘为另一学校教授，不定期去讲学，该教授便是另一学校的客座教授）	指在国外学有专长后被聘请回台在大专院校任课的人
小妹（小妹妹）	还指机关学校打工的年轻女工
导师（带研究生教授、副教授）	指中小学教师、班主任
出租车（供临时雇用的小汽车）	指把车租出去
缩略语产生的同形异义。如：	
公车（公家的车）	公共汽车
传习（传授学习）	传统观念习俗
脱产（如脱产学习）	法律用语、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责任，而将自己的财产藏匿起来，即脱出财产之意。
高考（高等学校新生入学考试）	政府选择公务员的高等考试
劳保（劳动保险）	劳工保险

台湾国语受闽南方言影响，形成与大陆普通话差异。如：

土豆（马铃薯）	花生
豆油（大豆榨的供食用的油）	酱油
生理（机体的生命活动和体内各器官的机能）	还指生意

牵手（拉手）

还指配偶

麻雀（一种鸟）

还指麻将

东南亚等国的华人地区通行华语，由于社会的经济、文化背景不同，有些词语跟普通话产生差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新加坡的经济发达，人民生活富裕，讲究敬老爱幼传统，所以他们把老年人称为乐龄人士，让老年人的晚年过得幸福、快乐。

3.汉语中的社会方言与文化：社会方言是语言的社会变体，指使用同一种语言又有共同文化的人由于社会的阶层、职业、出身、教育程度、性别、年龄等的不同而产生措词、言谈的不同，甚至因特殊行业交际需要而产生自己的行业用语或隐语。如成语“街谈巷议”指城里大多数人说话的类型，他们谈论的话题、措词。他们的举止反映这一阶层的群体文化。又如商业上的行业语如大腕、大款、倒爷、走穴、穴头、宰人、炒股、收盘等词，从事商业界的人比较内行。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不断革新、文化形态的不断演进，人们的社会分工越来越严格细密，大多数人终身从事某一行业，因此就会被限定在某个“圈子”里，掌握和应用这“圈子”里的知识、经验、技术、工具等方面的词语，使人们感到“三句不离本行”、“隔行如隔山”。

潘家懿先生在谈到隐语与群体文化时曾举一例。山西夏县（属晋南地区）有几个村庄广泛流传着一种隐语。如管苇子叫“蛇”，簸箕叫“本”，买叫“乃”，价钱叫“同”，一叫“一溜”，二叫“大番”，三叫“居沉”，四叫“套手”……据说当地这类隐语在明朝中叶就已经产生了。原来，这一带到处长满茂密的芦苇和藤条，村民们世代编织席子和簸箕，编织后即拿到集市上去卖，同时又从外边购进原料。村民们为维护本行业的经济利益，在公开交易的场合下，对卖与不卖以及价格多少往往需要商量对策、统一口径，出于这种文化心理，用来帮助做买卖的一套隐语就这样产生了。又侯精一先生在《山西理发社群行话研究报告》一文中，谈到理发社的群行话，把“头发”叫“苗儿”，把“耳朵”叫“木耳”，把“鼻子”叫“气筒”，把“脖子”叫“车轴”，把“帽子”叫“顶盖儿”等。

4. 汉语中的外来文化：汉语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中奠定了它的重要地位，并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圈”。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最大的贡献，在物质方面是丝绸、造纸、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而在精神方面是浩如烟海的文化古籍及中华民族所具有的优良传统。在同世界的交往中，汉语也不断地吸收融合其他民族的文化。汉族与其他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至今已有两千年历史。从西周开始，中西就开始文化交流，从借词、译词中反映出中外物质、制度、宗教、艺术、科技等方面的来往。

物质文化方面包括丝织品、铁器、铜器以及各种珠宝、香料等，来自匈奴（包括北狄、胡）以及西域各国的物产音译词。如胭脂（又作“燕支”、“焉支”、“燕脂”，均为音译词，来自匈奴）、琵琶、葡萄、苜蓿；意译词方面如胡麻、胡桃、胡豆（今蚕豆）、胡荽（又称芫荽）、胡椒等。“胡”本代称北方民族，后泛指外国或外族的。中古时期有来自尼泊尔的波棱（菜），尼泊尔语 *palings*，古代尼泊尔为“波棱国”。《新唐书·西域传》：“泥波罗（尼泊尔）……（贞观）二十一遣使人献波棱、酢菜、浑提葱。”近代有琉璃、琥珀、糖霜（冰糖）、条纹布等，现代从西方来的物品更加丰富，从部分借词中可看出。如药品类的维他命、盘尼西林，食品类的巧克力、可可、威士忌，日用品类的沙发、T恤衫、夹克衫、电视机、录像机，武器交通工具类的坦克车、卡车、拖拉机、巴士、的士等。

宗教方面的交流也留下一些语言遗迹。西汉末年，印度佛教开始传入我国，

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印度梵语的借词如佛、塔、魔、菩萨、夜叉、罗汉、袈裟等进入汉语的词汇，近代日本编的《佛教大词典》收入佛教词语达3万5千多条，这些都是历代翻译佛经的产物，“佛、塔”等还成为根词，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如“佛”有“佛士、佛事、佛缘、佛身、佛龛、佛家、佛学、佛谷、活佛、信佛”等三十来个，“塔”有“塔台、塔身、宝塔、水塔、金字塔、灯塔、纪念塔”等二十几个。有的还反映了佛教的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如“衣钵、顶礼膜拜、三生有幸、普度众生、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立地成佛”等。有的是汉民族的语言注入佛教文化内涵。如“荷花”又名“莲花”，从《诗经》至历代许多文人作品中都有不少赞颂莲花的佳作，“莲”与“廉”同音，本指廉洁，诗人用来比喻“出污泥而不染”、“亭亭净植”的高贵品质，后来“莲”作为词根，组成的词带上佛教的文化，如“莲介（佛介）、莲经（佛经）、莲台（佛座）、莲字（佛寺）”等。到近代汉语词汇中，如基督、耶和華、救世主、夏娃、亚当、圣经、教堂等反映基督教文化的传入；又安拉、阿訇、穆罕默德、穆斯林、古兰经等借词反映伊斯兰教的传入。

制度文化方面的词语如“平等、自由、博爱、人权、通牒、照会、法人、法医、法庭”等，科技文化方面的词语多得不可胜数，详见第三章《词语与中国文化》。

总之，从古至今的汉语中所留下的借词、译词可以洞察中外文化交流所涉及的内容和文化。当然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中国与外国长期的贸易中，也不断地向外国传播中国的传统文化。

第二节 汉语与中国文化研究的性质、意义和方法

一、汉语与中国文化研究的性质

“汉语与中国文化”这门学科属文化语言学，而文化语言学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它是就汉语和文化的关系进行探讨，它着眼于同文化有关的语言现象，它是属语言的范畴。正如吕叔湘先生在《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一书中所说：“我所了解的文化语言学是说某一民族的某种文化现象在这个民族的语言里有所表现，或者倒过来说，某一民族的某一个语言里有某种现象可以表示这个民族的文化的一方面。照这样理解的文化语言学当然是语言学的一个方面，是值得研究的。”

文化语言学 and 结构语言学不同，结构语言学如果从索绪尔算起已经有一百来年历史了，他们主要是研究语言本身，把语言当做一种工具进行解剖，离开人文因素、社会环境和使用语言的人只研究语言的内部规律。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可都讲的是这种工具的部件和结构，没有讲从前怎样使唤这种工具。”而汉语与中国文化研究是对词语、句子等在建构过程中的思维方式、语言环境及其所蕴涵的心理因素进行解释，当然在探讨中，也免不了对汉语的字形、词汇、语法结构形式和意义作些具体分析，但这种分析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对汉语结构规律作抽象化的概括和描述不同。

文化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有些共同点，都是主张强化人文性，强化语言的交际功能。陈建民先生在《语言文化社会新探》一书中说：“一个多世纪以来，语言研究明显的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描写型，另一种是人文型。结构语言学把语言当做工具进行纯粹描写，属描写型。文化语言学高度重视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

属人文型……”他又把单纯描写语言结构的语言学称小语言学，把解释语言与社会共变、语言与社会共存并且注重应用的语言学称大语言学。把语言看成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的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属于大语言学范畴。那么汉语与中国文化研究的语言观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重视汉语交际的传统价值

言语的交际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它往往渗透着民族的文化精神，并成为这一民族某一时代的文化镜像之一。例如“价值”，古代主要指商品交换的比值，今“价值”意义扩大了，它不仅包括经济价值，还包括道德、宗教、艺术、科学、语言、风俗等各方面的价值观念。

俗话说：“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家和日子旺，国和万事兴”、“爱国如家”。中国人有重视家庭的传统观念，因家庭是社会基础，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国家是由千千万万无数家庭组成的。自古以来，中国人所追求的家庭幸福是“多子多孙”、“子孙满堂”、“几代同堂”，若当人们称赞你：“很有福气，子孙满堂”你会为之自豪，内心感到无比的安慰和说不出的甜蜜感、幸福感。相反，若被人骂为“无后”、“无香火可续”，那是极其可悲和伤心的，骂人者是极其恶毒的。在我国传统观念中，几代同堂认为是幸福的，正常的，可在西方却非如此。前段杨澜视线谈到一个现象：在美国的华裔家庭面临着教育子女的难题。有些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建家立业后，买了房子，养了孩子，并接父母到美国居住，形成了三代同堂的家庭，可作为在美国长大的第三代却不习惯这样的家庭，他们提出：为什么别人家庭没有跟爷爷、奶奶同住？为此，不愿带学生到家里来，怕人家耻笑。这跟西方教育子女的方法有关，子女长大就自立，对父母没有赡养的义务。

中国人特别重视教育子女和讲究子女孝道，父母抚养教育子女，使其长大成人，而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孝经》开篇就讲：“夫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不孝则被视为叛逆，不仅众人共讨之，法律也重惩之。《尚书》云：“刑三百（种）罪莫重于不孝。”儒家认为孝敬父母是人子之德与责。有一次，子游问孝，孔子曰：“今之孝者，是所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指对父母养而不敬，就同养牲畜差不多。宋代词人柳永著《劝学文》：“父母养其子而不教是不爱其子也；虽教而不严，是亦不爱其子也。父母教而不学，是子不爱其身；虽学而不勤，是亦不爱其身也。是故养子必教，教必严，严则必勤，勤则必成。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这是家庭教育的一个哲理，望子成龙，不能不重视声传身教，而严格、勤勉正是“家教”之道，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若你的孩子考上大学、硕士、博士或有了一官半职，人们会用敬仰的眼光看你，会赞扬你教育有方，你就会感到心安理得，无愧于祖宗和后代，否则你就会觉得脸上无光，问心有愧。

政治、经济的因素对方言的势力及其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如闽南话的代表点，早期是泉州古城，鸦片战争以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成了五口通商口岸，厦门成了闽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济地位远非漳、泉所能及，厦门话终于成了闽南方言代表。吴方言的代表点从苏州移到上海也是这个道理。改革开放后，沿海经济突飞猛进，粤语的影响扩大，价值升高，甚至还有北上的趋势。1987年海峡两岸大门打开以后，以厦门话为代表的闽南话在闽南金三角甚至在台湾、东南亚的经济地位不断上升。这些例子都说明不能忽视语言的经济价值。

由于语言具有经济价值的特点，这就牵涉择语、学语的问题。从前，家里几代人或夫妻都是本乡本土，都讲当地方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一些特区或改革开放的城市，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操不同的方言母语结为夫妻的家庭越来越多，

于是选择哪种方言教育子女的问题，也就跟哪个方言的经济价值相关，这自然会受到语言经济、交流价值支配。另一方面为了体现语言的交际价值，除注意民族的传统文外，同时也要注意交际双方的性别、年龄、职业、文化水平等，这样才能获得交际的良好效果。

（二）重视普通话的地方变异形式

普通话虽然是在我国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但它却发挥了民族共同语的向心作用。随着推广普通话的不断深入，汉语各方言区逐渐向它集中、靠拢，但在这靠拢集中的过程中，由于各地方言习惯势力的影响，难免使普通话带着南腔北调的特点，带着各地方音成分，我们称它为普通话的地方变异形式，如说粤语或闽南语的人把自己的方音、词汇、语法格式带进普通话，这是难免的，因人们对自己从小学到的母语有一种强烈的偏爱心理，这种偏爱心理就会发展为语言感情，特别是中国人有“不忘祖宗言”的观念，许多海外华侨回乡后仍然说着一口较纯正的“祖宗言”，这正如唐代诗人贺知章晚年回到家乡的肺腑之叹：“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这种乡音情感是最朴实、亲切的，这种语言的认可和乡音情感产生一种向心力、凝聚力。因此汉语与中国文化的研究，不能忽视对普通话的变异形式的研究，带着方言腔的普通话，都在为当地人民服务，全国公民以它为交际语言，是关系到方言区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和存在，不管你承认与否，地方普通话一定会长期存在，这是客观事实。方言和地域文化的研究不仅对推广普通话有积极作用，而且对交际双方都是有利的。在推普方面，我们研究规范的普通话和方言的对应规律，利用对应规律举一反三学好普通话，另一方面又用地方普通话积极地影响方言，促使汉语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逐渐向普通话集中，加快中国语言文化发展。在交际方面，我们在研究普通话的同时，也要从社会需要出发，研究方言区普通话的变异形式与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的关系，以便达到交际双方的共识。如谐音现象在我国社会交际中普遍存在，不同方言可以谐不同的音，了解谐音文化的人，只知道普通话的谐音是远远不够的。如上海人把“苹果”读如“病故”，看望病人切忌带“苹果”，其他方言区“苹果”与“病故”完全不谐音，也就不存在这禁忌。台湾在婚俗中忌“葱”，因它跟“冲”谐音，而老北京人在孩子出生后洗三时，拿葱打小孩，并说：“一打聪明，二打伶俐”，这是因为普通话“葱”与“聪”谐音的缘故。

（三）重视汉民族的心理素质

语言结构系统跟汉民族的心理素质是有关系的。十九世纪德国心理学家冯特认为：“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心理具有社会性，而表达人们心理工具的语言也具有社会性。语言是为交际存在的，交际的目的是为了表达思想的，因此，语言是一种为交际过程所制约并带有心理烙印的一种符号体系。一个民族的词汇和文法本身，就能揭示这个民族的心理素质。”

不同民族由于历史、文化的区别也产生民族文化心理不尽相同。中国有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尊卑分明、贵贱有序的观念和心理。在这观念和心灵的指导下，若用对举方式构成的复合词时，次序一般是按“先尊后卑”排列的。名词方面如“天地、国家、君臣、父子、夫妇、男女、母子、长幼、子孙、兄弟、姐妹”等；动词方面如“生死、存亡、进出、来去、买卖、成败、得失”；形容词方面如“胜败、远近、大小、优劣、高矮、长短、厚薄、粗细”等，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如左右、贫富等。这种词语次序也体现出汉民族在言语表达方面的价值取向。拿“左右”来说吧，左、右二字主要为辅助之义，于是辅助义之左右则加“亻”旁作“佐、佑”。以后表方向之“广、又”，通用“左、右”。

《说文》所载，属左右二字古形古训。在卜辞中，“佑助”指对下的神助，“佐助”则指臣对君或下对上之辅助。此为古礼“以右为尊”所产生的源头，所以“左”与“差”为同源，“差”的下部为“左”。如《左传·襄公廿一年》：“管蔡为戮，周公右王”，大臣虽皆辅助周王，而“周公右王”并含有周公乃大臣中地位最高者。这就是由来已久的右尊左卑的传统文化之证。由右尊左卑再引申为右为正，左为不正，右为支持，左为反对，如“旁门左道、意见相左、无出其右”等皆是由右尊左卑演化而来的。

“求中”是汉民族心理素质之一，这种心理素质制约着汉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汉语词法、句法结构也有影响。表现在某些词语或词性的模糊性方面，如“端正、纯正、学习”等词，用在“学习态度端正”，“学习”是名词，“端正”是形容词，用在“端正学习态度”，“端正”是动词，“队伍很纯洁”中“纯洁”是形容词，而“纯洁队伍”中的“纯洁”却是动词。这种既不能简单地归为A类或B类的词，陈建民先生在《语言文化社会新探》一书中称为“中介词”。表现在句子的单复句界限的模糊性方面，如“外行夸奖一百句，不着边儿，不如内行的一句（叶圣陶）。”从意义关系方面着眼，“外行夸奖一百句”和“不着边儿”是主谓关系，合起来是个单句，这个单句和“不如内行的一句”又是主谓关系，全句仍然单句。从结构方面着眼就不然。可以解释为“外行夸奖一百句，[话]不着边儿，[这样的一百句话]不如内行的一句。”又是复句了。这就牵涉到靠体会句意或靠语法标准划分的问题，标准不同，意见就不同。吕叔湘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一书中说：“像汉语这种不爱搞形式的语言，要严格区分单句和复句，确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二、汉语与中国文化研究的意义

上面我们已说过语言和文化的涵义及其它它们之间的关系，说明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化，人类思维与语言同时出现，人类起源之时就是人类社会诞生之日。语言是社会现象，是文化形成发展的前提，文化的发展也促进语言的丰富和完善。而汉语与文化的研究，就是要从汉语来看中国文化。整个人类的文化，首先表现为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等，而中国文化属东方文化之列。中国文化具有普遍性和整体性。因此从汉语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加深了解中华民族文化，有利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中国”此名的形成就蕴涵着很深刻的文化意义。据高令印先生在《中国文化纲要》一书中说：“……相传禹治水分为九州，即八方加中央。中即四方之中。中华者，居天下中心之城而富有文化者也。”国原意为城，古代学者认为帝王之所即为中，所建城邑就是中国，人们认为君的国都是土中，大地的中心。传说武王伐纣成功后，便考察四方，寻找“土中”，结果找到“伊洛平原”，定都洛阳，此地便成为中原、中州、中土，以后逐渐演变为把华夏民族的居住地和建立的国家叫“中国”。隋唐后，有的自称“中国”，把邻国（如日本等）称为外夷。唐·韩愈说：“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传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这是把印度称为外夷。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多以汉、唐、宋等自称，鲜有称中国者。“中国”更多地含有文化的意义。战国公成子说：“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财货之所聚也，圣贤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元·王元亮说：“中华者，中国也……”真正以“中国”作为国名，要算是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